

冲突抑或融合

——明清之际浙江学人与
西学东渐

贾庆军 著



海洋出版社

本书为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课题“新航路开辟后
浙江的对外交流与经济文化新变动”(06JDHY001ZD)最终成果

冲突抑或融合

——明清之际西学东渐与浙江学人

海洋出版社

2009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冲突抑或融合：明清之际西学东渐与浙江学人 / 贾庆军著 . —北京：
海洋出版社, 2009. 7

ISBN 978 - 7 - 5027 - 7504 - 9

I. 冲 … II. 贾… III. 东西文化 – 文化交流 – 研究 – 浙江
省 – 明清时代 IV. K295.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10336 号

责任编辑：陈莎莎

责任印制：刘志恒

海洋出版社 出版发行

<http://www.oceanpress.com.cn>

北京市海淀区大慧寺路 8 号 邮编:100081

北京海洋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所经销

2009 年 7 月第 1 版 2009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张: 9.25

字数: 222 千字 定价: 35.00 元

发行部: 62147016 邮购部: 68038093 总编室: 62114335

海洋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前 言

有关明清之际西学东渐的学术著作已经很多了，如沈定平的《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史——明代：调适与会通》（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江文汉的《明清间在华的天主教耶稣会士》（上海：知识出版社，1987年）、张维华的《明清之际中西关系简史》（济南：齐鲁书社，1987年）、孙尚扬的《基督教与明末儒学》（北京：东方出版社，1994年）、徐海松的《清初士人与西学》（北京：东方出版社，2000年）、张西平的《中国与欧洲早期宗教和哲学交流史》（北京：东方出版社，2001年）、黄一农的《两头蛇——明末清初的第一代天主教徒》（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李天纲的《跨文化的诠释——经学与神学的相遇》（北京：新星出版社，2007年）、（法）谢和耐的《中国和基督教——中西文化的首次撞击（增补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张晓林的《天主实义与中国学统——文化互动与诠释》（上海：学林出版社，2005年）、刘耘华的《诠释的圆环：明末清初传教士对儒家经典的解释及其本土回应》（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等。在上述著作中，多少都涉及传教士与浙江学人的交往。但由于其着眼点是全中国，就不能全面而深入地探讨浙江学人与西学的关系。近年来，也出现了专门研究传教士与浙江学人关系的著作，如钟鸣旦的《杨廷筠：明末天主教儒者》（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赵晖的《耶儒柱石——李之藻、杨廷筠传》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等。但是这一领域著作数量相对较少，而且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有待拓展。本书就是在这方面的一次尝试。

本书选取了三个具有代表性的浙江学人作为研究个案。通过研究他们与传教士及其西学的交流，我们能够大致了解浙江学人在西学东渐中的表现和反应，进而了解中西文化交流的基本情景。这三个代表人物分别是黄宗羲、杨廷筠、李之藻。从表面上看，黄宗羲代表正统的儒家士人，他对西学的态度就是蔑视和拒绝；杨廷筠代表开明的儒家士人，他希望融合耶儒学说，拓展儒学的天地；李之藻则代表现实的儒家士人，他希望从西学的逻辑、科技知识中找到富国强兵的新方法、新手段。这三种态度基本上代表了当时浙江学人甚至是中国学人对西学的态度。但是当我们深入考察，却发现，这三种态度最终都可以归结为一种态度，并将导致相同的结果。这一种态度就是黄宗羲正统士人的态度，结果就是耶儒的冲突和对抗。因为从本质说，杨廷筠和李之藻仍然是正统的儒家士人，他们仍然是在儒家思想框架内去理解和接受西学。他们将面临的结果是，要么拒绝西学，要么抛弃儒学。这种非此即彼的结果正是文化交流的艰难所在。这使我们意识到，差异较大的文化要想真正的融合是非常困难的，它们常常表现为征服和被征服的冲突关系。

本书的章节安排是根据这三个代表人物对西学的态度类型而定的，因此并没有按照他们的时代和年龄顺序进行排列。正统的黄宗羲首当其冲，沉迷伦理道德的杨廷筠在其次，现实而明智的李之藻断后，最后再以黄宗羲为总代表进行耶儒对话。其中穿插了对卢梭思想的讨论，是因为中国学界总是将他和黄宗羲相提并论，本书在这里要表明的是，这其实是一个误会。这场对话以儒学的胜利和传教士的被驱逐而告终，这也是在宣布对话的失败和冲突的难免。

目 录

第一章 明清之际传教士东来之历史背景	(1)
一、基督教本身的普世化要求	(1)
二、新教改革给天主教带来的压力	(5)
三、地理大发现提供的传教机遇	(10)
第二章 明清之际传教士东来时浙江知识界之状态	(15)
一、明清之际浙江实学思想的产生及其实质.....	(15)
二、实学观念与西学交流的便利和障碍.....	(55)
三、小结.....	(56)
第三章 浙江学人与西学之关系	(57)
一、黄宗羲与西学	(57)
二、杨廷筠与天主教	(82)
三、李之藻与西学	(134)
四、中西思想冲突之具体展现——以黄宗羲、利玛窦和卢梭 的思想为例	(169)
第四章 启示与思考	(275)
参考文献	(280)
后记	(287)

第一章 明清之际传教士 东来之历史背景

明清之际耶稣会士东来有着广阔而深刻的历史背景，综合起来看大致有如下几个大的背景。

一、基督教本身的普世化要求

基督教的普世化倾向要追溯到《圣经》本身，《以赛亚书》中，耶和华曾对雅各说：“你作我的仆人，使雅各众支派复兴，使以色列中得保全的归回，尚为小事，我还要使你作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我的救恩，直到地极”（赛 49: 6）。这样，上帝已经给他的圣徒布下神圣的使命，不仅要使以色列内部在上帝信仰下统一起来，还要向外邦传教，直到整个世界都皈依上帝。

而上帝派下来拯救人类的耶稣也明确提出要拯救整个世界，而不只是犹太人。耶稣曾说过：“我另外有羊，不是这圈里的。我必须领他们来，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并且要合成一群，归一个牧人了”（约翰福音 10: 16）。

将这一使命付诸实践的是耶稣的门徒们。在《使徒行传》中曾经记载彼得给外邦人施洗的事，当众信众责难他时，他辩白道：“我在约帕城里祷告的时候，魂游象外，看见异象，有一物降下，好像一块大布，系着四角，从天缒下，直来到我跟前。我定睛观

看，见内中有地上四足的牲畜和野兽、昆虫并天上的飞鸟。我且听见有声音向我说，彼得，起来，宰了吃。我说，主啊，这是不可的。凡俗而不洁净的物，从来没有入过我的口。第二次，有声音从天上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这样一连三次，就都收回天上去了。正当那时，有三个人站在我们所住的房门前，是从该撒利亚差来见我的。圣灵吩咐我和他们同去，不要疑惑。同着我去的，还有这六位弟兄。我们都进了那人的家。那人就告诉我们，他如何看见一位天使，站在他屋里，说，你打发人往约帕去，请那称呼彼得的西门来。他有话告诉你，可以叫你和你的全家得救。我一开讲，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正像当初降在我们身上一样。我就想起主的话说，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你们要受圣灵的洗。神既然给他们恩赐，像在我们信主耶稣基督的时候，给了我们一样，我是谁，能拦阻神呢？”众人听见他这话，就不言语了。只归荣耀与神，说，“这样看来，神也赐恩给外邦人，叫他们悔改得生命了”（使徒行传 11：1~18）。神的旨意再次显示，督促其门徒赶紧将其福音传播到更大的领域。带着神圣的使命，其门徒开始向外邦展开行动，即使困难重重，他们也义无反顾。

保罗和巴拿马将彼得开始的向外邦传道之事业推向了一个高峰。虽然在传道过程中保罗几乎被众人用石头打死，又有人阴谋杀害他，但他仍然坚持执行上帝的旨意。他对自己得到的启示深信不疑，他说：“主啊，我在路上，晌午的时候，看见从天发光，比日头还亮，四面照着我，并与我同行的人。我们都仆倒在地，我就听见有声音，用希伯来话，向我说，扫罗，扫罗，为什么逼迫我。你用脚踢刺是难的。我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你起来站着，我特意向你显现，要派你作执事作见证，将你所看见的事，和我将要指示你的事，证明出来。我也要救你脱离百

姓和外邦人的手。我差你到他们那里去，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权下归向神。又因信我，得蒙赦罪，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亚基帕王啊，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
的异象。先在大马色，后在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以及外邦，劝勉他们应当悔改归向神，行事与悔改的心相称。因此，犹太人在殿里拿住我，想要杀我。然而我蒙神的帮助，直到今日还站得住，对着尊贵卑贱老幼作见证。所讲的，并不外乎众先知和摩西所说，将来必成的事，就是基督必须受害，并且因从死里复活，要首先把光明的道，传给百姓和外邦人”（使徒行传 26：13～23）。雅各等也充分肯定了保罗他们所做的事，他说：“诸位弟兄，请听我的话。方才西门述说神当初怎样眷顾外邦人，从他们中间选取百姓归于自己的名下，众先知的话，也与这意思相合。正如经上所写的，此后我要回来，重新修造大卫倒塌的帐幕，把那破坏的，重新修造建立起来。叫余剩的人，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外邦人，都寻求主。这话是从创世以来，显明这事的主说的”（使徒行传 15：13～19）。

此后，保罗留下了他那著名的《罗马书》，在此书中，向外邦人传道成为使徒上帝信仰的必然组成部分。上帝信仰的普世特征更加明显了。“为什么我还受审判，好像罪人呢？为什么不说，我们可以作恶以成善呢？这是毁谤我们的人，说我们有这话。这等人定罪，是该当的。这却怎么样呢？我们比他们强吗？决不是的。因我们已经证明，犹太人和希利尼人都在罪恶之下。就如经上所记，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他们用舌头弄诡诈。嘴唇里有虺蛇的毒气。满口是咒骂苦毒。杀人流血，他们的脚飞跑。所经过的路，便行残害暴虐的事。平安的路，他们未曾知道。他们眼中不怕神。我们晓得律法上

的话，都是对律法以下之人说的，好塞住各人的口，叫普世的人都伏在神审判之下”（罗马书 3：7～20）。这样，犹太人和外邦人的区别荡然无存，在上帝面前，所有的人都是罪人，上帝的审判是普世的，上帝的救赎也是普世的。保罗最后鼓励其弟兄们积极向外传播基督的福音。“弟兄们，我自己也深信你们是满有良善，充足了诸般的知识，也能彼此劝戒。但我稍微放胆写信给你们，是要提醒你们的记性，特因神所给我的恩典，使我为外邦人作基督耶稣的仆役，作神福音的祭司，叫所献上的外邦人，因着圣灵，成为圣洁，可蒙悦纳。所以论到神的事我在基督耶稣里有可夸的。除了基督借我作的那些事，我什么都不敢提。只提他借我言语作为，用神迹奇事的能力，并圣灵的能力，使外邦人顺服。甚至我从耶路撒冷，直转到以利哩古，到处传了基督的福音”（罗马书 15：14～19）。

从此，基督教便走上了普世化的道路。如果说在彼得、保罗时期，基督教向外邦扩展多少是迫于犹太人内部的排斥浪潮的话，到了教会时期，这一活动就成了主动的了。大约到了公元 170 年后，随着正统教义的确立和教会组织的形成，基督教开始自称为“公教会”（Catholic Church），意为普世性教会，其任务和目标就是要拯救整个世界。直到 1054 年东西方教会分裂时，西方教会仍自称“罗马公教”（也就是传入中国的“天主教”——笔者），标榜自己的正统性和普世性。^① 在教会的组织下，传教士的传教活动就更加活跃了，只要教会力量所及之地，就是传教士的福音传播活动所到之地。随着新航路的开辟，西方教会力量开始越出欧洲，走向全世界，传教士的活动也将遍及世界。一个真正的普世性教会就要出现了。

^① （美）G. F. 穆尔：《基督教简史》，郭舜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 年，第 47～50 页。

二、新教改革给天主教带来的压力

到了16世纪，教会发展的前景本来一片光明：欧洲的异端浪潮基本平息；宗教会议时代的危机已经过去；教皇的权力与威信得到重新恢复。教会接下来的任务就是改革其某些历史积弊并复兴宗教生活。在西班牙等地已经开始进行教会革新了。^①但是一个偶然事件打乱了教会的时间表，迫使天主教作出了一系列激烈而重大的政策调整。这个偶然事件就是由马丁·路德发起的新教改革运动。

路德针对教会发售赦罪券的行为发起了一场宗教改革运动。这场改革运动以否定教皇和教会的权威为核心。路德根据“因信称义”的原则建立了新的教派，即路德教。改革的结果是路德教派与天主教的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拥护路德教的诸侯与拥护天主教的诸侯在两败俱伤之后，于1555年缔结了奥格斯堡条约。条约规定教随国定。这就变相承认了新教的合法性。在德意志，新教与天主教分庭抗礼的局面逐渐形成。不过，事情还没有结束，在瑞士、法国、英国也发生了新教改革的连锁事件，在整个欧洲天主教都受到了挑战。这就迫使天主教必须作出及时的反应，调整自己的政策，以便收回自己失去的地盘。

面临新教的挑战，天主教采取了一系列应对措施。首先，它在教会的行政管理、教会生活方面进行了彻底的整顿和治理，再次明确天主教会沿袭已久的、普遍公认的规定和纪律原则。其次，在教义方面针对新教的诘问作出新的规范和调整，重新编订一本天主教的教理问答，抵制新教的宣传。最后，在前面工作的基础上，发起

^① (美) G. F. 穆尔：《基督教简史》，郭舜平译，第214页。

了强大的天主教复兴运动。^①

正是在天主教复兴运动中，出现了耶稣会。其创始人是西班牙贵族依纳爵·罗耀拉。在其从军期间，他接触到了天主教思想，立即心向往之，决定做一名耶稣的战士。1534年，他和沙勿略、法伯尔等6位同伴结成一个团体，发誓要“愈显主荣”。这被看做是耶稣会的开端。^② 1540年，教皇保罗三世认可耶稣会是天主教的一个正式修会。但同时向其提出一个草案，规定其人数不得超过60人。这份草案包括五个部分：①任何想成为上帝的战士的人，在发了贞洁誓愿后，应牢记他是团体的一部分，创立这一团体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基督教徒灵命的长进，通过宣讲圣经、灵性操练、慈善工作，特别是教育儿童和文盲来传播信仰。②每个成员都是上帝的战士，都应服从我们神圣的主保罗三世和他的继承者，为了灵命的长进和信仰的传播，无论他命令干什么，把我们派到土耳其、新世界、路德派、异端或其他信仰的人那里，我们都应毫不逃避、毫不辩解地立即去执行。③在所有相关团体的事情上，每个成员应服从上级。④要尽可能地远离贪婪、接近神贫，因为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将为他的仅仅寻求天国的仆人预备必需的衣食。每个成员应坚守神贫，无论个人或集体都不应拥有财产或接受薪俸、报酬。⑤在做弥撒和宗教仪式时，不使用管风琴和合唱。禁止对肉体进行苦行折磨。^③ 这一草案就成为耶稣会的基本宗旨。它塑造了耶稣会士的基本特征：贞洁、忠诚、安于神贫的上帝之战士。

为了完成自己的使命，耶稣会建立了独特的组织，培养了别具

① （美）G. F. 穆尔：《基督教简史》，郭舜平等译，第266—273页。

② 胡玲：《耶稣会创始人——罗耀拉》，《世界宗教文化》，2004年第2期，第10页。

③ 胡玲：《耶稣会创立目的之考析》，《淮阴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3期。

一格的传教人才。在组织和管理上，耶稣会仿效军队编制，组织严密，纪律森严，以军人的服从原则作为首要原则。会内实行层层控制，会士之间相互监督，并强调绝对服从上级。总会长为终身制，总会长对各地会士拥有绝对统治权，故有“黑衣教皇”之称。正式会士除发三愿（绝财、绝色、绝意）外，还发第四愿，即绝对效忠教皇。会士除应遵守会规外，尚须按照伊纳爵所著《神操》一书的要求，进行灵魂的修炼。这本书首先提供了一种体验宗教生活的方法，教人通过对罪、公义和审判的默想，引起对罪的憎恨，使灵魂得到净化；接着要通过对基督神国的默想，培养献身于上帝事业的热情；最后则是考验和巩固这一热情。通过把宗教生活的困难呈现出来进行考验，接着指出克服困难的方法。整个训练的目的，就是要使灵魂充满对上帝的爱，从而服务于上帝及其教会。^① 会规规定会士每年应仿效福音书所载耶稣在旷野中 40 天的事迹，独自潜修。在这 40 天中，无论居何职位者均须摆脱会务，根据《神操》内容默思祈祷，此为“大避静”。一般虔诚教徒则行“小避静”，期限为 3 天或 7~8 天不等。

耶稣会能产生如此大的影响，有赖于他的如下行为：一是其传教活动；二是其向宗教和世俗权力高层的渗透；三是其对会士的严格教育。在这些活动中，传教是其最终的目的，其他两项则是其坚实的保证和基础，尤其是教育活动。

罗耀拉敏锐地看到，要想使天主教恢复活力，最重要的就是天主教徒本身素质的提高。因此，耶稣会极为重视教育。为此，罗耀

^① (美) G. F. 穆尔：《基督教简史》，郭舜平等译，第 274 页。

拉兴办许多教会学校和教会大学，如著名的罗马学院和日耳曼学院。^① 在耶稣会的高等学校中，其教学内容和教学方式都有独特之处。在教学内容上，耶稣会高校不像其他高校教授神学、法学和医学，而是教授哲学。但是这哲学却内涵丰富，它包括逻辑、形而上学、心理学、伦理学、自然神学，还有自然科学如代数学、几何学、天文学和生理学等。这样的哲学课程要学习 3 年。其中，罗耀比较重视亚里士多德的著作，所以耶稣会将亚里士多德看成是和托马斯·阿奎那同等神圣之大师，他们的著作是耶稣会哲学和神学的主要源泉。所以我们就不奇怪为何来华之耶稣会士多用亚里士多德的思想来批判儒学和佛学。而且难能可贵的是，罗耀拉将最新的自然科学知识纳入到教学内容当中，足见其眼光之前瞻性。看一看利玛窦在罗马学院的教学计划，就会知道为何利玛窦的科学知识会如此渊博。他的教学计划如下：第一学年，算术（全年）；第二学年，《几何原本》前 4 卷（四个月）、实用算术（一个半月）、地球仪（两个半月）、地理学（两个月）、《几何原本》第 5、6 卷（其余时间）；第三个学年，古观测仪（两个月）、行星论（四个月）、透视画法（三个月）、钟表和与宗教活动有关的计算问题（其余时间）。^② 完成哲学课程的会士将获得硕士学位，他们在初等学校中执教五六年后，便可继续学习神学。耶稣会的大学开设 6 年神学课程。前 4 年致力于研究圣经、希伯来语和其他开启圣经奥秘的东方文字，还有教会史、教会法规、选修课和神学仪式；后两年进一步研究、复习往日所学哲学、神学功课，并准备一篇公开发表的论

^① 胡玲，何日取：《耶稣会教育与天主教的复兴》，《世界宗教研究》，2008 年第 1 期，第 101 页。

^② 樊洪业：《耶稣会士与中国科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 年，第 5 页。

文。如论文答辩和公开测试成功，即可获得神学博士学位。在教学方式上，罗耀拉提倡循序渐进，如要求学生学了文法才能学文学和修辞，有了人文学科基础后才能学习哲学、神学。此外，他还强调学生的记忆功夫，^① 以至于许多耶稣会神父博闻强记、记忆力超群。^② 当这长达 15 年左右的训练完成后，才有可能成为耶稣会正式会员。待向教皇宣誓效忠后，才可能成为神父。可见，成为耶稣会神父之困难和荣耀程度。这样一位神父，无论其学识还是道德水平，都是其同时代人中的佼佼者。^③ 难怪乎他们会博得中国儒家精英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等人的敬佩和赞扬。

正是这些才能出众而又热心于上帝事业的耶稣会士，对天主教的传教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不畏艰难险阻，不怕生死威胁，终身不娶，为上帝的事业奉献出全部。而这在平常人看来匪夷所思的事情，却使他们感到无比荣耀。有了这些忠诚、热心之传教士，天主教的事业注定要扩展到全世界。如保罗三世提出的草案所说，将天主教传播到异邦，将福音带给陌生的土地，正是耶稣会士工作的重点。因此，当他们出现在远隔万里之中国时，我们也就不再

① 胡玲：《罗耀拉与耶稣会教育》，《淮阴师范学院学报》，2002 年第 5 期。

② 利玛窦就曾以超众的记忆功夫一举征服上层士人。据说他能当众将临场指定的儒家经典中的段落倒背如流。他这种本领甚至使他成了宗室诸王的座上客。后来，他禁不住众儒士请求，还将记忆之法写成了一本书来应付他们，这就是《记法》一书。朱维铮主编：《利玛窦中文著译集》，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 年，第 141 页。在耶稣会练就的记忆能力竟也成为传教的得力助手，是利玛窦始料不及的。

③ 杨廷筠也曾经描述过耶稣会神父之优秀，“惟一种特达之贤，愿入耶稣会，称会士者，方守童身，出家学道。学道而有得者，称撒责尔铎德，千百中无一，国中所最贵也。盖其国之人相习成风，以此种人为第一流，如状元及第，中华所美，人人争羡。父母兄弟所祈望，惟愿得为铎德，即不翅荣福，无复他愿”。杨廷筠：《代疑篇·答人伦有五止守朋友一伦尽废其四条》，利玛窦等撰，吴相湘编：《天主教东传文献》，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65 年，第 562—564 页。杨廷筠将耶稣会神父职位与中国状元相提并论，可见其才能之高、荣耀之巨和使命之大。

必大惊小怪了。

三、地理大发现提供的传教机遇

如果说前面两种因素为传教士东来提供了依据和动力的话，地理大发现则为其提供了实现之条件。确切地说，这不是什么地理大发现，因为古人其实已经发现了这些新大陆。这一次之所以被人们记住，因为它是西方崛起和开始扩张的标志。在地理大发现背后隐藏的是欧洲自然科学知识的发达和物质力量的飞速发展。

经过长时间的积累，欧洲人已经拥有了先进的地理、天文、数学等自然科学知识。1543年哥白尼《天体运行》及日心说的发表，标志着近代科学体系的诞生。第谷则将哥白尼的天文学推进了一步，而且他为后人留下了关于天体运行的极为精确的计算方法，这是其20余年天文观测的伟大贡献之一。开普勒则继承了前两者的丰富遗产，不仅印证了日心说，还提出了行星运动三项定律，使天体运行之计算更为精确。同时意大利也出现了伟大的物理学家伽利略，他以实验与数学相结合的方法奠定了近代力学的基础。^① 总之，近代科学的发展为欧洲人征服和驾驭大自然做好了知识上和技术上的准备。

而此时欧洲也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一种新型的生产生活方式产生了。这种新型的生活方式以追求物质和生产物质的效率为核心。一个庞大的商人和市民社会逐渐形成，大大促进了欧洲物质财富的增长。而资本主义的特征就是对财富的无止境的追求，这就成为为其开拓海外市场、进行殖民活动的原始动力。现有的财富积累

^① 沈定平：《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史——明代：调适与会通》，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105—108页。

已经使它具备了殖民的能力。于是，现有的财力加上先进的技术，就开启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地理大发现活动。而地理大发现与资本主义殖民活动是相辅相成的。

在欧洲人打通通往世界各地的一条条通道时，有一条就延伸到了中国。葡萄牙人于 1511 年侵占马六甲，1553 年又通过欺骗手段获得了在澳门的居住权，这样葡萄牙人就建立了一条从里斯本到印度果阿，再到澳门的通道，这是当时欧洲人进入中国的主要通道。^①

在欧洲人殖民的过程中，殖民势力与教会紧密合作。于是殖民活动推进到哪里，传教活动就开展到哪里。为此，还出现了著名的“保教权”之争。葡萄牙和西班牙在争夺海外殖民地过程中，也在争夺势力范围内的宗主权和宗教裁判权，以至于引出了著名的教皇子午线事件。这样，中国就属于葡萄牙的势力范围。所以，来到中国的传教士一般是受到葡萄牙的支持和赞助。

1510 年，葡萄牙人攻占了果阿，并设立总督。而教皇保罗三世则于 1534 年在这里设立了果阿主教（后来称为印度大主教），统领葡属所有东方领地的教务。另外，宗教法庭总审判官也驻扎在这里。于是果阿就成了去东方传教的传教士的中转站和大本营。许多修会在这里建立修道院和礼拜堂，如方济各会、多明我会、圣衣会和耶稣会等。耶稣会还在此处创办学校培养传教士。

而澳门则是另一个重要的教会城市和传教中心。许多修会在这里设立会所，其中尤以耶稣会最为有名。耶稣会在这里创办了圣保罗学院和天主圣母堂两所著名的大学，成为培养优秀传教士的摇篮。著名的利玛窦、高慎思等耶稣会士都在这里学习和工作过。^②

① 樊洪业：《耶稣会士与中国科学》，第 2、3 页。

② 沈定平：《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史——明代：调适与会通》，第 93—96 页。